

黑龙江民族研究论丛
HEILONGJIANG MINZU YANJIU LUNCONG

E LUNCHUNZU

鄂伦春族历史、 文化与发展

韩有峰 都永浩 刘金明 著

LISHIWENHUAYUFAZHAN

哈尔滨出版社

黑龙江民族研究论丛
HEI LONG JIANG MINZU YANJIU LUN CONG

鄂伦春族 历史、文化与发展

孙有峰 郝永浩 刘金明 著

哈尔滨出版社

鄂伦春族历史、文化与发展

韩有峰 都永浩 刘金明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鄂伦春族历史、文化与发展 / 韩有峰、都永浩、刘金明著 . —
哈尔滨 : 哈尔滨出版社 , 2004.3
(黑龙江民族研究论丛)

ISBN 7 - 80639 - 731 - 0

I . 鄂 … II . ①韩 … ②都 … ③刘 … III . 鄂伦春族 - 研究
IV . K28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3892 号

责任编辑 : 戴淮明 吴颖丽

封面设计 : 索 鑫

· 黑龙江民族研究论丛 ·
鄂伦春族历史、文化与发展
韩有峰 都永浩 刘金明著

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革新街 170 号

邮政编码 : 150006 电话 : 0451 - 86225161

E - mail : hrbcb@yeah.net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东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50 千字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 册

ISBN7 - 80639 - 731 - 0/C · 20

定价 : 220.00 元 (全 10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 0451 - 86225162

作者序

鄂伦春族是我国东北地区古老民族的后裔，世代居住在大小兴安岭广袤的丛林之中。由于特殊的生存条件和历史环境，使整个民族长期从事着以狩猎为主，采集和捕鱼为辅的生产方式，过着居无定所、住无房舍的游猎生活，其社会发展极为缓慢，直到解放前夕，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发展阶段。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采取多种特殊政策，帮助其实现定居，发展生产和提高文化发展水平，使整个民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原来的基础薄弱、发展时间短暂等原因，与其他兄弟民族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如何使鄂伦春族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其尽快跻身于先进民族之列，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自成立以来，便将鄂伦春族的历史、文化及其发展作为研究的重点，撰写并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我与永浩、金明撰写的这部专著便是其中之一。

十几年来，我们基于对鄂伦春族研究的浓厚兴趣，撰写了一些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并公开发表于省内外的一些学术刊物上，得到了社会的好评和学术界的肯定。为了集中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以作为实际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参考，今择其部分整理成册，奉献给广大读者。

由于我们的学术水平有限，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敬请读者和同行批评指正。

韩有峰
2001年6月于哈尔滨寓所

目 录

作者序	1
一、鄂伦春族历史概论	1
(一)鄂伦春族族源	1
(二)历史上鄂伦春族地区的社会组织机构	6
(三)路、佐制对鄂伦春氏族制瓦解的影响	14
(四)民国初年鄂伦春族的军事组织	24
(五)民国初年库玛尔路猎民的反抗斗争	33
(六)北洋政府招抚鄂伦春族的政策	40
(七)民国初年“抚鄂安边”政策浅析	49
(八)定居前的鄂伦春族社会结构	58
二、鄂伦春族社会结构及发展	68
(一)鄂伦春民族体形成标志及其特点	68
(二)鄂伦春族社会形态的直接过渡及其发展	74
(三)鄂伦春族地域“乌力楞”的特点	89
(四)重大历史变革	100
(五)影响鄂伦春族发展的几个因素	110
(六)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民族发展的关系	118
(七)在新形势下的思考与抉择	122
(八)鄂伦春族的社会发展	130
(九)鄂伦春族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	135
三、鄂伦春族经济	143
(一)定居前鄂伦春族的游猎经济	143

(二)民国初年鄂伦春族的农业	153
(三)鄂伦春族农业生产的首倡者来忠	160
(四)定居前鄂伦春族的农业	163
(五)鄂伦春族狩猎生产资料和组织形式	170
(六)鄂伦春族的狩猎生产	178
(七)自然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188
(八)鄂伦春族经济发展问题	195
四、鄂伦春族文化	199
(一)索伦部三民族关系及文化复合	199
(二)鄂伦春族文化环境适应与发展	204
(三)鄂伦春族传统衣饰、饮食和居住方式	217
(四)鄂伦春族的婚姻习俗	233
(五)鄂伦春族的丧葬习俗	242
(六)鄂伦春族民间文学瑰宝——摩苏昆	248
(七)鄂伦春族桦树皮镶嵌画艺术	253
(八)鄂伦春族原始宗教崇拜及占卜	256
五、鄂伦春族调研报告	269
(一)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应充分重视历史上后进民族的特点 ——新生村鄂伦春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情况 的调查	269
(二)关于黑龙江省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发展情况的 调研报告	275
(三)关于建立黑龙江省鄂伦春族中学的调研报告	283
(四)关于鄂伦春族经济发展现状及实现现代化 的调研报告	290
后记	305

一、鄂伦春族历史概论

(一) 鄂伦春族族源

鄂伦春族是我国东北地区古老民族的后裔，有着悠久的历史。鄂伦春族的形成，也同其他民族一样，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阶段，是在生活于黑龙江流域的古代民族无数次地兴衰更迭、频繁迁徙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据历史记载，生活于黑龙江流域的古代民族很多，有活动于西部的东胡、鲜卑、室韦、契丹、蒙古等；有活动于中部的涉貊、索离、夫余等；有活动于东部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那么鄂伦春族究竟属于哪个族系呢？直到目前为止，学者们根据自己所研究的成果，各抒己见，莫衷一是。有的说源于室韦^①，有的说源于肃慎^②，还有的说源于鲜卑^③及传说中的玄夷人（即倭人）^④等。但是集中起来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室韦说，二是肃慎说。为了证实自己论点的正确，学者们从民族语言、分布地域、经济类型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列举了诸多论据予以论证。如持鄂伦春族属肃慎系的学者们认为，根据近代语言学、人类学研究的结果肯定，鄂伦春族属通古斯系，不仅语言属通古斯语族，而且属通古斯系的人们还曾以挹娄、勿吉、靺鞨等族被记载于当时的诸多史书中^⑤。还有的学者根据《三国志·挹娄传》记载认为，“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一带，应当包括在挹娄分布区内。因此鄂温

① 冯若实、赵履、于志耿、孙秀仁和《鄂伦春简史》编写组等。

② 陈玉书、孙进已和《满族简史》编写组等。

③ 索斯诺夫斯基《鲜卑—鄂温克》。

④ 贝卢琼《东成见闻录》。

⑤ 陈玉书《关于鄂伦春族的来源》。

鄂伦春族历史、文化与发展

克诸族的先人，在汉代可能是包括在挹娄分布区内。因此鄂温克诸族的先人，在汉代可能是包括在挹娄这一统称之中。”^① 同时，还否定了鄂伦春等族源于室韦系的钵室韦的观点，其根据是“室韦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②。因此，钵室韦不是鄂伦春等族的先人。而持鄂伦春族属室韦的学者们，为了说明鄂伦春族的祖先是北部室韦的某部，从地理位置方面对鄂伦春族的族源问题进行了论述。“肃慎在牡丹江流域，挹娄在松花江下游，勿吉在拉林河流域，没有任何记载提到这些部曾分布到室韦及居住地区。”^③ 从而得出结论，肃慎、挹娄等与鄂伦春族没有渊源关系。还有的学者从经济类型和物质文化方面加以论证，如室韦和鄂伦春人都曾“以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及“桦皮盖屋”、“骑木而行”^④，因此，室韦与鄂伦春族有渊源关系等。笔者认为这些论证应该说都是论之有据，因为一个民族共同特征的形成，必须同民族形成以前的历史状态，即当时的民族语言、分布地域、经济类型及风俗习惯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现在的民族特征就是在诸古代民族特征基础上逐渐演化而来的。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这确实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民族是一个客观事物，与其他事物一样，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统一体，这就有一个方法问题。正确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综合研究的方法。客观事物是复杂的，尤其是民族族源问题，要认识和把握它更不容易。因此，要搞清一个民族族源问题，必须遵循这一研究方法，从诸多的例证中把那些偶然的、非本质的舍弃掉，还要进一步探求那些与例证、历史与现状之间的复杂联系，这样方能得出

① 孙进已《东北民族源流》。

② 孙秀仁《室韦史研究》。

③ 孙秀仁《室韦史研究》。

④ 《北史·室韦传》。

正确的结论来。如果单从某一方面,或只凭一两个例证就认定一个民族的族属问题,难免出现些偏差。目前,对鄂伦春族的族源问题的研究之所以出现不同意见,并得出不同的结论,其根源恐怕就在这里。

共同语言是民族的一个特征,也是识别一个民族族源的重要依据。因此,要探讨一个民族的族源问题,必须与该民族的语言结合起来一起研究,否则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来。我们都知道,鄂伦春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北语支,对于这个定论直到目前为止,大概还没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不仅为大量的历史资料所记载,而且也为现存的民族语言所证实。鄂伦春语与同属肃慎系的满族及赫哲族语言相同,不仅基本词汇相同,而且语法结构也相同,这绝非偶然。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其形成和发展是有一定的过程的,从氏族、部落语言发展到民族语言,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可以说,一个民族语言发展的历史同该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同样悠久。而且民族语言还有着很强的承继性,一种语言一经形成,就“有巨大的稳定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性”^①。因此,从民族语言方面来分析,鄂伦春族属肃慎系,是通古斯语族的肃慎及其以后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民族一脉相承下来,直到形成满、赫哲、鄂温克和鄂伦春等民族。有的学者说,鄂伦春族源于室韦族,从语言学方面分析,是不相符的。因为据《魏书·室韦传》等文献记载:“室韦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同。”这说明室韦语不属通古斯语族,而属蒙古语族。所以鄂伦春族的先人不应是室韦族,而应是肃慎族。

共同的经济生活,是民族形成、发展的决定性条件,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民族当然也就不会形成。鄂伦春族同样也不例外。我们知道,鄂伦春族是我国典型的渔猎民族,直到解放前夕还从事着这种原始的渔猎经济。但是鄂伦春族的这种经济类型的存在,绝不是后来才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鄂伦春族历史、文化与发展

形成的，是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我国北方诸古代民族原始经济的延续。风俗习惯是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一种反映，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传统和心理感情，是民族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风俗习惯不是民族所固有的，也不是后天短时期内形成的，而是在民族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任何现代民族都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任何现代民族必然或多或少地都保留有其先人的风俗习惯。因而许多学者为了搞清鄂伦春族的族源问题，将现代鄂伦春族的狩猎活动与古代民族的渔猎经济，以及近代鄂伦春人居住“斜仁柱”和穿用滑雪板追捕野兽等习俗，与古代民族“以桦皮盖屋”、“骑木而行”的习俗相比较研究，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然而，我国早期的北方民族都曾从事过渔猎经济，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据历史记载，不仅室韦族“以射猎为务，食肉衣皮”^①，而且唐末辽初属肃慎族系的女真也“善长狩猎”^②。直到明代，虽然南迁的女真人开始了农耕，但是留在北方边远山区的女真人，多数仍然从事着渔猎经济。由于都从事着同样的经济活动，因而也必然产生相似的风俗习惯。所以“以桦皮盖屋”、“骑木而行”的习俗也不是某一个民族所特有。如滑雪板不仅是通古斯文化的特征之一，而且“此种察纳（滑雪板）在突厥斯单、蒙古斯单等地多用之”^③。看来，单从这二者很难搞清鄂伦春族的族源问题。

那么，地缘关系是否有助于搞清鄂伦春族的族源问题呢？下面不妨让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民族最初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人们只有在一个地域内长期共同生活、相互交往才能形成一个民族。因此，要搞清一个民族的族源问题，还必须弄清在该民族生活或曾生活的地域内，历史上都曾有哪些古代民族活动过，然后才可能

① 《东北史纲要》。

② 《多桑蒙古史》。

③ 《鄂伦春族探源》。

从中找出与该民族有关的族系来。我们知道，贝加尔湖以东的黑龙江流域的广袤地区，是鄂伦春族及与其同源的鄂温克等民族世代繁衍生息的区域。那么，在这一区域内都曾有哪些古代民族活动过呢？据《三国志·挹娄传》中载：“挹娄，在大东北千余里，滨大海，未知其北所极。”《新唐书·室韦传》中也记载：“室建河出俱伦，迤而东，河南有蒙凡部，其北落坦部，水东合那河、忽汗河，又东贯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从上，我们不难看到，黑龙江的南北岸很早就有挹娄、靺鞨诸部的活动。冯君实先生也曾考证：“黑龙江省上游，两汉时为鲜卑地，下游为黑水靺鞨。”近代的许多中外考古学者在黑龙江北岸的精奇里江和牛满江等地，也都相继发现有黑水靺鞨文化的遗存。这就进一步证明，在黑龙江中游及北岸不仅曾有室韦诸部的活动，属肃慎族系的靺鞨诸部也都曾在此活动过。我们知道，“室韦”这一族称是蒙古语“森林或森林中人”的意思。根据对室韦诸部研究的逐步深入，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室韦”并非指单一的民族，而是指居住在黑龙江流域中西部广大地区属东胡——鲜卑系的诸室韦；东北部地区则有属肃慎——靺鞨系的通古斯诸部。之所以都称为“室韦”，是根据中原史学家们的习惯称呼，以后逐渐便成为对居住在这一区域内所有民族的统称了。民族作为生活在不同地理条件下的人们共同体，与其他动物界一样，是在不断的迁徙变化过程中生存发展下来的，任何一个民族或氏族部落，不可能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内永久居住不动，这也是人类生存斗争的必然结果。当然，黑龙江流域的诸民族也不例外，都有过频繁的迁徙。据有关历史记载，秦汉时期的鲜卑族在黑龙江流域的中、西部地区强盛起来之后，就开始逐步西迁南下，并在中原建立起了北魏王朝。继而在其故地兴起了室韦族，填充了鲜卑族西迁南下后所形成的空白地区。当以室韦为主体的契丹、蒙古等民族形成，并大部南下西迁之后，其周边诸多民族和部落群，包括从东北部迁来的通古斯诸民族集团，又填充了其原住地。以后如类似的迁徙，还曾有过多

鄂伦春族历史、文化与发展

次。据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的研究结果证实,北方通古斯人在历史上就曾有过四次大的迁徙。可见,黑龙江流域民族或氏族部落迁徙之频繁。因此,在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内,经常是多民族杂居而存在的。但是,不管这些民族如何迁徙、杂居,他们的语言及风俗习惯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完全消失的。所以,历史上有“室韦与靺鞨同俗”、“语言与靺鞨相通”,实际就是与肃慎——靺鞨系同源的通古斯诸部,而不是东胡后裔室韦族,只是因居住在同一地域环境内而被称之为“室韦”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纳如下:从语言方面看,鄂伦春族语属通古斯——满语族,与肃慎系的靺鞨族语相通,而不同于蒙古语族的室韦语言;从经济类型和风俗习惯方面看,鄂伦春的狩猎活动和许多习俗虽然与室韦族相似,但是这种经济类型和风俗习惯是北方诸多民族所共有的,因此与肃慎系靺鞨族的风俗也接近;从地缘关系方面看,在鄂伦春的居住地是曾有室韦族活动,但是他们并非单一族,有的虽然被称为“室韦”族,实际上还有肃慎系的靺鞨等族。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鄂伦春族的族源应该是肃慎系的靺鞨族,而不应是室韦或其他民族。

(二)历史上鄂伦春族地区的社会组织机构

1. 金、元、明时期

在金、元两朝,鄂伦春人包括在“林木中百姓”中。1218年,成吉思汗遣术赤征讨吉利吉思等林木中百姓,各部臣服,成吉思汗将这些林木中百姓授与术赤管辖。

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元在全国范围调整行省建制,全国分置10个行省,林木中百姓在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的管辖之内。

明朝时期,鄂伦春人包括在黑龙江省以北的“北山野人”的范围

内。1409年(永乐七年),明朝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建立了奴儿干都司,“北山野人”归其管辖。

2. 清朝时期

清朝是鄂伦春民族形成过程的重要时期,清政府进一步加强对鄂伦春人的统治。

崇德五年(1640),把“索伦部”居民分编为八牛录(佐领)。鄂伦春人属于“索伦部”中的一部分。

康熙元年(1662),在宁古塔将军之下设“布特哈八旗”,鄂伦春人在其管辖范围之内。

康熙二十二年(1683),在宁古塔将军管辖内分出黑龙江将军,下设八城,设副都统、总管等职。同年,根据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奏请,为收抚鄂伦春人被其统治,编入布特哈八旗。隶布特哈旗充官兵者曰摩凌阿鄂伦春(意骑马鄂伦春);游猎山林失去驯鹿的鄂伦春曰雅发罕鄂伦春(意步行鄂伦春)。在鄂伦春地区,派有布特哈官员5人分治,三年一易,号曰安达,以征貂之便,统治鄂伦春人。

以下是当时鄂伦春地区的组织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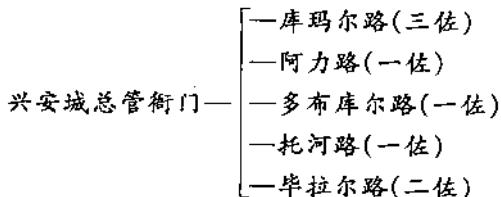
布特哈是打牲部落的总称,在其广阔的统治范围内,以嫩江为界,东为东布特哈,西为西布特哈。路的范围相当于鄂伦春人的部落。

布特哈总管衙门统治鄂伦春人达200多年,由于弊端很多,光绪八年(1882),被废止。废止的原因,一是,鄂伦春人久居山林,受安达、教官欺骗、压榨,生活如奴畜;二是,黑龙江北岸被俄国侵占,猎区

鄂伦春族历史、文化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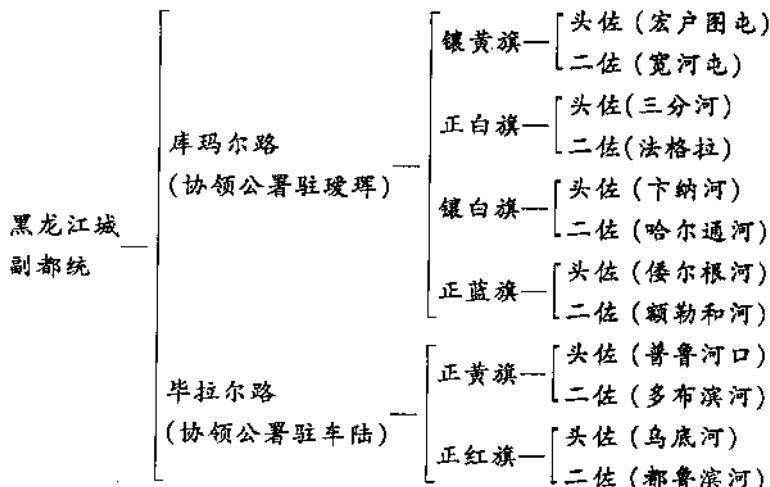
仅限于江南，猎物逐年减少，生计困难；三是，为巩固边防，有必要将鄂伦春人编旗设官，将原来的鄂伦春官兵千余名分辖于各佐领管理。

布特哈总管衙门废止后，同年，在五路中心的龙镇县第四站 18 里处建兴安城，设立兴安城总管衙门。其组织机构如下：



兴安城总管衙门设总管 1 人，副总管 10 人，其中，鄂伦春人副总管 8 人。

光绪十九年(1893)，为加强对鄂伦春人的统治，依据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的奏请，废止了兴安城总管衙门，将鄂伦春人分属于黑龙江、墨尔根、呼伦贝尔三城副都统管辖，其组织和所辖地区如下：



墨尔根城副都统(驻嫩江)—阿力多布库尔路(协领公署驻布
· 8 ·

西)——镶红旗——
[头佐(阿力河)
二佐(多布库尔河)]

呼伦贝尔城副都统(驻海拉尔)——托河路(协领公署驻海拉尔)——
镶蓝旗——
[头佐(毕拉尔河)
二佐(珠尔干河)]

《黑龙江志稿》记载：光绪二十二年，黑龙江将军奏请收拢鄂伦春人，分归瑷珲、墨尔根、布特哈、呼伦贝尔四城管理，瑷珲分上下二路，墨尔根、布特哈、呼伦贝尔各为一路，每路专设协领一员，以资收集，相沿既久，有名无实。此说与上面所举有出入。

以上组织机构的变动对鄂伦春人的影响很大。它把鄂伦春人依照居住地编入佐，二三佐为一旗，若干旗合为一路。鄂伦春人的地方最高统治者是副都统，每一路设一协领，佐有佐领(一名)、骁骑校(一名)、领催(四名)、委官(二名)、委领催、披甲等。佐领是佐的最高权力者，处理佐内的军事、行政、司法、治安等事项。佐领除定期向协领报告情况外，对佐内鄂伦春人的管理有不行文的命令权、判决权，所以佐领独揽了对鄂伦春人的生杀予夺之权。

旗制仅是个区划，实际上隶属于协领的佐领才是鄂伦春人的直接统治者。一般来说，副都统和协领均为满族人，佐领则为鄂伦春人。

1911年(宣统三年)，黑龙江城副都统改组，将库玛尔路和毕拉尔路改属黑河道道尹公署，其他均未变动。

3. 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1912)，鄂伦春人组织机构如下：

黑龙江省督办公署(公署内设旗务处)——
[库玛尔路(八佐)
毕拉尔路(四佐)
阿力多布库尔路(二佐)]

海拉尔蒙古衙门——托河路(二佐)

鄂伦春族历史、文化与发展

民国时期，鄂伦春族青壮年先被编为保卫团，后又称为山林游击队。

4. 伪满洲国时期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将原库玛尔路、毕拉尔路、阿里多布库尔路、托河路一律置于伪黑龙江省民政厅蒙旗科管辖。各路的协领公署虽未撤销，但已成了有名无实的机构。

1934年，伪满洲国将各省分为小省后，伪黑河省表面上保留着库玛尔路协领公署和毕拉尔路协领公署，但实际上由黑河特务机关控制，由特务机关长委托的副县长（日本人）直接指导。此时，佐领已被废除，在各个地区设立了以下山林队：

呼玛五个队：

第一队（倭勒河）

第二队（奈温河）

第三队（宽河流域三道卡附近）

第四队（塔河口上游）

第五队（盘古河）

瑷珲五个队：

第一队（九道沟）

第二队（五道沟）

第三队（哈尔通）

第四队（二三站附近的麦牙哈）

第五队（铁力县）

逊克两个队：

第一队（五道林）

第二队（三间房和阿廷河两处）

山林队一般都由鄂伦春人组成，由日本人进行军事训练。

这一时期，阿力多布库尔路和托河路的鄂伦春人分别归伪兴安